

哈佛中國論壇

2003 年

哈佛大學

各位教授、學生、先生和女士：

我很榮幸能在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學之一的會議上演講，在此我要感謝大學及《哈佛中國評論》雜誌主辦委員會的邀請。

教育是一個全球性的議題。作為一個商人，我決定要以一個平凡家長、市民和致力於現代中國社會發展的人的角度去討論這個議題。我今天的演講並非要提供任何標準答案，而是為激發更多有關中國教育的想法。

首先，我們談教育的定義。

在眾多的定義中，我認為 20 世紀著名教育家伯拉罕·弗萊克斯納(Abraham Flexner)的說法最有啟發性。他說：「教育是開啟人類思想和心靈窗口的過程。這涉及到認知、理解及對理念和志向敏感的能力。」

對我來說，這是教育的理想目標。

要理解現代中國教育制度的發展，我們必須探究其發展歷史，尤其是政治和民生發展。

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在 1949 年成立以來，中國社會的民生和文化理念經歷了重大的轉變。在 1958 年至 1976 年期間，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

自 1950 年朝鮮戰爭起，中國的「閉門政策」使她徹底地與世隔絕。在 1979 年，中國終於放棄孤立式外交政策，展開由中央計劃經濟轉型至市場經濟體系的長征。

與此同時，經濟改革為社會和教育制度帶來了重大改變。

由 1949 年到 1957 年，中國教育制度一直仿效著蘇聯模式，以知識和技能培訓作為重點。不久，中國發現此模式並不適合國家。期間，所有私立學

校亦以按國家規劃制度來營運。

在 1958 至 1960 年的大躍進期間，國家的農業和工業產品面臨嚴重短缺，導致社會貧窮大大增加。當時的教育制度是按照「國家發展規劃」由國家制定的，所有教材由國家設計，甚至大學畢業生就業也是根據地區政府需要而安排的。

後來，持續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國家巨大的社會壓力和問題。

這徹底毀壞了教育制度，許多大學繼而倒閉。

尼克遜總統(President Nixon)在 1972 年歷史性出訪中國，但兩國直到 1979 年才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中國終於意識到經濟轉型的需要，並對外開放，旨在加快經濟發展速度。

隨著中國經濟在 90 年代蓬勃發展，國家由計劃經濟轉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由農業主導變為工業主導。無論是按政府需要培訓領袖，還是個人或家庭想要改善生活質素，現在無論在質和量上都需要改善中國的教育制度。

1985 年，中國沿著東岸地區實行「九年義務教育」制度，再陸續延伸到中國其他地區。

1993 年，教育新方針旨在提升教育質素和 100 所重點大學的發展。

終於在 1999 年，政府再度推展教育改革，推廣優質教育的概念。要建立現代中國所需的優勢，國家需要具獨立思考、解決問題、創新和適應能力的人才。

隨著教育制度改革的成功和佳績，社會上也衍生了一些問題。自從新教育制度實行以來，很多貧窮地區均缺乏教育基金。很可惜，到現在中國政府在教育上的開支仍然處於低位，使不同層面的教育資助仍然不理想，尤其是教師薪金方面。

在任何一個國家，教育的一個基本目標都是透過教導規矩和價值觀達至社會的團結。為了社會的穩定和減少貧窮問題，一個社會應該給予所有人公平的機會。

即使中國社會主義是一個無階級、人人平等的社會，中國的社會和經濟差異在過去二十年大增，而地區之間的教學差異正是經濟發展有別的直接原因。從我個人的經驗，由上海世界級的中學，例如育才中學，到西部細小破舊的村校，我在探訪不同學校時觀察到很大的差異。自從學校資助在 1985 年改革後，西部內陸的貧窮地區在教育開支和發展上遠遠趕不上富有的沿海省份。

因此，中國教育的財務改革必須就對社會造成不平等的影響和保護人口中弱勢社群的需要作出平衡。技術方案，例如一個跨政府的教育撥款制度，以及協助低收入人士是必需的。而真正需要的是一個長遠的政策及承諾，以平衡教育及國家的發展。

我希望以下簡報能提供一些建議和解決方案。

總括而言，作為一個經歷了境遇好壞、見盡捉襟見肘和豐衣足食生活的人，我了解到教育是一個讓所有人能夠在同一起點公平競爭的重要開端。如果我有一個願望，那就是全世界所有人，不論男女，不論貧富，都有機會接受一定水平的基本教育。高等教育可能給那些志願投身領導層的人，但基本教育應開放給所有人，給予他們在學習中成長和發展的機會。我誠摯地希望所有政府都能優先處理這問題。

最後，我相信無論我們將來的教育制度怎樣改變，現代教育的精神都應旨在收窄不同民族的距離，啟發大家去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和種族。

教育，不論在中國還是其他國家，也應該被視為一個達至人類盡善的必要條件，從而成為世界和平及和諧的根基。

各位先生女士，謝謝你出席今天的論壇。